俄罗斯

户晓坤

一、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

2017 年对于俄罗斯思想界而言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俄罗斯文化传统中独特的弥赛亚意识与历史主义信念使其对于自身命运始终保有强烈的精神自觉，纪念俄国革命胜利 100 周年、纪念《资本论》第 1 卷发表 150 周年作为具有世纪跨度的时间节点，将对俄罗斯历史道路的自我反省提高至新的时代高度并开展出对于当代挑战的积极回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经过长期反思与学术化沉淀，在 21 世纪资本逻辑全球化的整体背景中呈现出回归与复兴趋势，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程质的飞跃、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与国家转轨，对于这一独特民族国家而言，无疑是需要进行深刻反省的重大现实领域，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未来的历史走向，自近代以来俄罗斯的历史命运同样折射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力量博弈与现实关系的整体运动进程。

2017 年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正是基于上述意义开展出思想争论与理论探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俄国革命问题上的立场争论与思想交锋；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领域对俄国革命及其历史道路问题作出

了积极回应；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不同思想立场与政策主张成为争论的焦点，从而引发出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社会性质及其过渡方案的广泛讨论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东欧等国家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21 世纪资本逻辑全球化背景下边缘国家的道路抉择与现实困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广泛争论。虽然历史巨轮不可逆转，但是学者们依然将俄国能否避免激烈的社会革命而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现代化转型作为争议性问题。

《抉择》作为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阵地，2017 年以纪念俄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为核心主题发表了系列文章，将当代俄罗斯学界认同与否定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性质的立场冲突推向公共学术平台，开展出积极的理论对话与思想交锋。由俄国革命性质的不同判断所进一步开展出来的，不仅有关于十月革命作为二月革命的延续还是质变问题，而且直接关涉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本身所定向的社会历史阶段，以及如何超越资本逻辑建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等）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特殊民族国家历史道路相结合、21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的非线性运动与社会主义的“替代性”等贯穿 21 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在由俄国革命当代阐释所引发的诸多争论中获得了丰富的时代性内容，使特定社会历史展开的矛盾性与过程性得以具体化呈现并为思想所把握，从而克服对于历史性事件简单化、抽象化的定论模式。

布兹加林、舒宾、斯莱温等当代俄罗斯左翼学者积极参与了关于俄国革命之于俄罗斯以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讨论，在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积极推动下，对于俄国革命的百年忧思，以及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未来趋势的审视判断，形成了 2017 年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格局和理论关怀。在上述总体性视域中所形成的具体问题领域包括：如何基于百年时空跨度评价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并将其积极转化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理论资源；如何澄清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政治立场、思想方法及其本质差异；如何理解社会革命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如何评估列宁和斯大林在俄国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作用；如何分析导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突变性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非线性过程的累积性矛盾及其转化、复杂性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等。П. 柯尔特加夫将目前俄罗斯学界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创新阐释区分为三个领域：以布兹加林、科尔加诺夫以

及 В. Л. 伊诺采耶夫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领域；А. Б. 巴拉耶夫、Т. Б. 特卢卡契、А. Д. 马伊塔夫，В. М. 梅茹耶夫、А. А. 克列卡耶夫、С. В. 维斯科诺夫、С. Н. 马列耶夫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领域中的持续努力；Б. Ю. 科拉利佐夫、В. Н. 舍甫琴科、Б. Ф. 斯莱文，О. Н. 斯莫林等学者所从事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另外 С. Н. 马列耶夫、Д. А. 马伊塔耶夫 等学者在社会哲学中开展出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研究。①

2017 年出版的俄国革命系列著作包括 В.С. 瓦尔沙夫斯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谱系》、Н.В. 乌斯特连洛夫《在革命的旗帜下：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В. 阿克从金《俄国知识分子和革命》、Ю. 阿勒杰莫夫《俄国革命》、В. 巴格达萨连《1917 年革命：俄国模式》、В. 卢斯杰姆《拯救俄国的革命》、В. 伊德兹斯基《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动力和本质》、Ю. А. 彼特洛夫《1917 年俄国革命：权力、社会、文化》（第 1、2 卷）、《伟大的战争和二月革命（1914—1917）》（第 1、2、3 卷）等；马克思、列宁思想研究著作包括 С.Н. 泽姆利亚诺伊《卢卡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М. 米哈伊洛娃《没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和俄国文学批判（1890—1910）》、Д. 叶夫根耶维奇《列宁：革命后一百年》、Е.А. 科捷列涅茨《为列宁战斗：最新研究和讨论》、А. 巴柳霍夫《列宁和克伦斯基》、Н.В. 乌斯特连诺夫《在革命的旗帜下：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第 1、2 卷）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研究著作包括 И. 戈拉耶夫《苏维埃联盟和社会主义》、А. 科日夫尼科夫《俄罗斯爱国主义和苏维埃社会主义》、Н.В. 米哈尔金《社会主义：昨天、今天和明天》、《赞成和反对社会主义：支持者和反对者眼中的俄国社会主义》等。

《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概论》一书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整个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将其从公共生活中排除出去会导致真正的方法论混乱。然而目前俄罗斯学生所接受的定性社会学教育已转向美国和西欧，其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作为苏联教科书过时的、片面的、狭隘的，甚至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该著作旨在从现代立场建立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体系及其发展趋势，吸收西欧左翼的思想成就以及拉美知识分子的理论探索，全书包括九章内容："古典马克思主义"；"东欧 '修正主义'"；"1968 年革命；

① П. Кондрашов Наброски к праксеологическому истолкованию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истории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2017.№ 2.

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中的民主问题”；“什么是苏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非正式马克思主义中的苏联经验分析”；“从阶级到政党；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①

《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唯一保障》一书旨在深入剖析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预测未能实现的现实根源，分析苏联解体和现实社会主义崩溃的多重要素，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思想基础进行严格批判，证明向世界社会主义转型成为延续和发展世界文明的唯一保障。全书包括如下章节：“自由主义模式——历史的终结还是社会的终结”；“从猿人到私有制社会”；“从私有制社会到马克思的理论”；“谁更善于阅读马克思：无产者还是资产阶级”；“苏联的历史”；“关于崩溃的原因”；“从智能到消费”；“世界社会主义还是世界大灾难”；“腐朽基础上的预测”；“马克思主义的完成：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等。②

《法兰克福学派与俄罗斯：德国理性主义与俄罗斯精神性传统综合的实验》一书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寻求俄、德两种哲学精神传统的综合，将法兰克福学派核心思想（哈贝马斯、霍耐特）应用于解释俄罗斯社会文化体系的现代性转变，并提出了法兰克福思想对理解俄罗斯现代化战略的思想路径。③ 作者深入研究了俄罗斯哲学独特的精神导向、以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和伦理价值观为基础的国家观念等问题，认为季诺维也夫、洛特曼、帕纳林、洛谢夫等兼具德语和俄语思想能力的学者将俄罗斯哲学传统介绍到欧洲和德国，在不同的哲学传统中开展出对话，补充并重新思考德国哲学思想对于俄罗斯和欧洲的意义。通过上述方式寻求在后危机时代全球化模式中意识形态的形成根据，并破坏现有的“以美国为中心”全球化模式，作者试图提出新的全球化模式，将德国理性主义和俄罗斯精神性传统综合为一个整体，即作为全球化发展的下一个质变阶段如何辩证地消除现有的困境与危机，使欧洲和俄罗斯文明应对危机策略得到表达和证明。该著作包括如下章节：“当代俄罗斯社会自我理解的反思路径：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经验”；“俄罗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克努特·汤姆

---

① Кагарлицкий Б.Ю.《Марксизм: Введение в социальную и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теорию》URSS. 2017. 320 с.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② Кремлёв С.《Мировой социализм: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гарантия сохран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URSS. 2017.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③ Шачин С.В.《Философия ФРАНКФУРТСКОЙ ШКОЛЫ и Россия: Опыт синтеза немецкого рационализма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сти》URSS. 2017.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森和托尔斯泰的文本比较分析”；“寻找主体意义——公民社会的演进：海德格尔思想作为获得自我理解的方法论”；“以德国‘商谈伦理’为棱镜研究暴力问题的经验”；“关于现代俄罗斯国家观念争论中的东正教传统之深入反思”；“深入反思东正教文化及其学者”；“宗教宽容的证明经验：康德与哈贝马斯的思想及其与东正教哲学的综合”；“重新理解正义观念：精神作为其自身的基础”；“法兰克福学派方法论运用于俄罗斯社会经济现实之哲学证明的经验”；“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及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理解”；“由马丁·海德格尔的方法论探索北方认同”；“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于北方日常生活的理解”；“以对话哲学为基础研究新欧洲主体性危机”。

《列宁为十月革命而斗争行动中的辩证法》一书以列宁（1917—1923）著作为文本基础，涉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关于十月革命的准备与实施分析、苏维埃政权与农民的关系、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与内战的胜利、新经济政策的发展、列宁的辩证法理论等问题。该专著旨在澄清苏联社会主义经验中的列宁遗产，包括如下章节：“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发展”、“列宁为十月革命所做的斗争：战略与策略，理论与实践生活，逻辑与直觉的辩证法”、“列宁在‘农村十月革命’与‘城市十月革命’”、“国家作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主要条件”、“列宁发展的新经济政策：辩证地揭示其政治，社会阶级和具体的经济实质”、“俄罗斯转型的自然特征：苏联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①。

2017 年度再版了苏联哲学家科索拉波夫的《理智和心灵的思想》一书。② 科索拉波夫是俄罗斯社会主义学会（RUCO）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其研究领域涉及劳动力激励问题、需求理论、劳动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社会学和哲学视域中的国际关系，组织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第 14—18 卷，并撰写序言。再版了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亨利希·库诺夫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埃克施坦恩共同完成的《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的阐释：剩余价值学说史》。③ 再版

① Солопов Е.Ф. Борьба В.И. Ленина за Октябрьскую революцию: Диалектика в действииURSS. 2017.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② Косолапов Р.И.《Идеи разума и сердца: Программный взгляд н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Изд.2.URSS. 2017.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③ Кунов Г., Экштейн Г.《Изложение IV тома «Капитала»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Теории прибавочной ценности》URSS. 2017. 72 с.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了苏联经济学家 E.C. 瓦尔加的著作，E.C. 瓦尔加是最早获得世界认可的苏联经济学家之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世界经济领域的专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趋势，包括经济周期和危机的研究、全球经济条件下的农业问题、货币理论等展开了深入研究。并第一次预测了 1929 — 1933 年全球经济危机在爆发后将资本主义进入稳定阶段，不同于大多数学者对危机导致资本主义体系崩溃的信念。他的著作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经济政策问题》、《稳定后衰退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货币：和平时期的权力和战争时期的崩溃》主要涉及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货币功能的研究，即作为交换媒介、建立市场关系、资本主义压迫的工具、剥削、发动战争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基础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新的尖锐矛盾；《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状况调查》旨在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对未来向深层转化的预测与分析。①

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 2017 年创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教育中心，2017 年 5 月 20 日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举行了纪念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出版 150 周年国际会议——“资本”——XXI：哲学，方法论，理论。会议报告显示如下共识：在《资本论》主要涉及的范围内资本主义保留了其一般特征：商品和货币拜物教、社会不平等、人与劳动、社会以及自我活动的异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关于人的存在的科学，以《资本论》为基础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现实问题提供了充满争议与论证充分的答案，包括俄罗斯现实的挑战；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些新方向在俄罗斯得到了充分发展，其中包括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俄罗斯联邦和国外得到了广泛认同。会议得到了莫斯科国立大学经济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抉择》、《政治经济学问题》等机构支持，由来自俄罗斯、希腊、意大利、法国、德国和独联体国家等 150 多名学者共同参与。本次会议包括研讨会“21 世纪政治经济学：《资本论》视域下的方法与理论”；圆桌会议“从《资本论》到现代性：社会经济矛盾及其解决方案”；“《资本论》与后资本主义：假设与现实”。2017 年 4 月 22—23 日召开了全俄国际学术会议“俄国革命和现代世界”；2017 年 2 月 2—3 日举办了国

① Варга Е.С. Начало общего кризиса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Кн.1: Деньги: их власть в мирное время и крах во время войны. Кн. 2: Кризис мирового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Кн. 3: Обзор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стран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URSS. 2017. 304 с. Мягкая обложка.

际学术会议“1917年伟大的俄国革命及俄国、白俄罗斯、欧洲和世界人民的命运”；2017年10月25—26日举办了西伯利亚历史会议“1917年革命：一百周年”。

二、马克思、列宁思想的当代阐释

（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研究

《马克思历史概念的实践阐释》一文旨在重建马克思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论，即唯物史观的多要素分析方法，及“社会存在决定意识”代表了对社会历史及其结构进行多重要素分析的基本原理。① 孔德拉绍夫认为，在马克思的实践观中，有三个重要方面需要加以区分：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是活动着的、特定社会的个人，人类社会起源于劳动过程中人的自我生成；在实践结构中马克思从未割裂物质和精神，因为在人的活动中两者总是辩证的总体；实践是具体的历史辩证主客体关系和相互作用，实践活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任何社会中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都是基本存在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这个基础上展开。

孔德拉绍夫试图在哲学史方面发展马克思实践观的总体性理论，正如葛兰西正确地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为实践哲学，然而在苏联传统中主要关注的是实践的物质（客观）方面。孔德拉绍夫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表述为：人们实际的生活过程构成了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生活的物质条件，因此“社会生活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的活动；人的感性活动，“现实的”活动，人的类本质；在共同活动的过程中复制和再现自己的存在，改变环境的同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社会对象；旨在满足实现社会制度和结构增长的“现实生活”；生命过程本身以具体的人的活动形式出现，其意识与物质活动交织在一起；在这个实际生活过程中，受限于主体视界以及社会客观，个体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在他们的现实中”由自身的实际活动产生了社会关系的集合；其所代表的是与他们的生产相同的东西，与他们生产的产品和生产方式相一致。

基于一个整体的社会生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创造、生产和再生产

① П. Кондрашов Наброски к праксеологическому истолкованию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истории.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2.

其物质和精神存在，而物质生产是社会总体的基础，整个社会有机体逐渐形成。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人们以某种方式理解自己的存在，并逐渐形成公共意识，这代表了整个社会存在作为复合体在人类心灵中的积极再现。马克思认为实践是内在统一（总体性）的，在其“存在”和“意识”辩证结构的总体性表现为个体的生命活动与心理活动形式。因此，马克思哲学中的社会意识相互关系应该在这一动态的、现实的方面得到理解。马克思思想中既没有本体论（如恩格斯晚期），也没有认识论中（如列宁的）与存在（物质）和意识（理想）的对立，在实践活动中存在与意识的对立消解了。马克思必须回答这一问题：如果实践（和人）是物质和精神活动的统一体，那么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总体性实践的两个方面中哪一方面对于整个生命过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孔德拉绍夫将马克思对历史进程的分析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混合的总体性。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自然资源和生存条件决定了物质生产本身，如游牧、狩猎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意识；第二阶段，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分化。由于劳动分工的出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开始以相对自主的形式存在，技术发展（即使在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时代）使得人的存在独立于环境成为可能，导致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依赖性的逐渐削弱，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自然条件、技术）决定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意识的内容，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较小，这一阶段包括传统社会、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信息（后工业）社会；第三阶段，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矛盾消除，形成新的融合。依循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和方法论，布兹加林提出了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新的定义，以晚期资本主义的“衰落”和“经济必然王国”为特征、“资本霸权的扩张与劳动人民社会创造力进步之间存在着反比关系”，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深入分析，同样的方法论科学地证实了马克思关于未来人的发展及其基本力量、素质和能力，公平性将成为社会再生产的最有效分工。

基于上述历史分析，孔德拉绍夫区分了关于人类历史的两种唯物论理解。一方面，人们可以从狭义角度对历史进行唯物论的理解，即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理论，社会存在决定意识。这个概念只涵盖了人类社会史的一部分，即资本主义。苏联解体后第二次“俄罗斯资本主义发展”经验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如何完全决定社会关系以及整个精神文化、公众意识和个人意识。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意识的直接确定可以通过社会物质存在来观察。苏联教条

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在于把这种只有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特征的核心模式推广到整个人类历史上。然而，在非资本主义时代（以及在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各种特定条件下）情况并非如此。因此，另一方面，可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谈论唯物论历史观，即作为整体的社会历史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是物质生活本身）方式如何决定了整个现实生活过程的结构、内容、机制和动态，包括社会意识。因为这个生命过程是物质和精神存在的辩证统一（即使它在社会上是分裂的），那么在每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框架内最重要的、支配性的驱动力要么是物质的（自然条件、技术、生产过程的组织），要么是理想要素（科学、意识形态、宗教、热情）的实践要素以及它们的综合。其中焦点在于研究实践的现实要素。在没有任何偶然性的情况下，物质生活在各个时期的生产和再生产始终是现实的基础，这使对历史的实践理解成为研究所有人类历史的充分理论工具。

马克思辩证地运用了多要素分析的方法来解释社会现象，同时揭示主导的决定关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整体，所有领域（社会实践）都是统一的，没有一个领先于另一个领域，经济实践仅在“最终分析”中决定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经济是社会历史存在的基础，只是作为最根本的决定力量，然而在特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非经济要素（政治、宗教、战争、科学伟人等）都可能成为主导性力量。在每个社会中存在着主导结构和等级关系。经济因果性通过支配结构间接运作，而不是直接影响上层建筑。个别实践在主导结构所确定的范围内根据其差异逻辑开展自身。因此，上层建筑是“相对自治”的。一方面，马克思认识到社会生活中存在必然性，它不是固定在“铁律”中，而是固定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规律上。马克思研究社会生活的规律，同时又提出了警告：社会过程与自然过程不同，可以显示其中一些行为的规律性，并证明这些要素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以这种方式发挥作用。而另一方面，在未来的社会中将出现这样的条件，社会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不是劳动（作为强迫活动），而是自觉的人类活动，即对自由王国的需求，“劳动转化为人的自我实现”。马克思的哲学应该被视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实践理论，在这一框架中，物质和精神要素在本体论上是平等的，历史动力在不同时代以不同力量出现，同时再现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基于上述分析，柯尔特加夫将马克思的方法论定义为积极有效的多要素论，当社会现象被各种要素解释时，这些要素在整个相互决定的复杂系统中的特定历史阶段都是有效的。正是在上述意义上，阿尔都塞强烈

反对马克思“一元论”的解释，奥尔曼要求回归“被遗忘的要素论”。在其个别部分中存在着辩证统一性（整体性）的优势，并且在每个特定历史情况下的特定要素将起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辩证法在社会学说中表现为结构复杂的整体。

马克思方法论的多元和多要素性是辩证法先行的，并不否认其基本的唯物论本质，与布兹加林、科尔加诺夫在《全球资本》中所使用的方法非常相关。在后期资本主义阶段，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有机体整体结构是非线性的和多维性的，这使后苏联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更多关注经济要素的决定性和非经济要素的主导性：以回归、退化、反革命等理论为基础，补充经典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社会研究方法论，主要以渐进发展为分析对象，深入分析现代社会中支配性社会经济系统的起源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倒退，晚期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变革属性；科学地证明转型国家的特点、社会时空的嵌入性质、各种社会制度的碎片化存在；转型过程的特征不仅在于发展的多态性和非线性，而且对于“主观要素”的实现具有强烈依赖性，即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文化素质、群众的精神状态。晚期资本主义的性质使马克思主义对具体历史阶段的研究获得重要意义，使日常生活处于整个社会复合体的基础之上，即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法律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等逐渐展开为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反映、沉淀，并再现这些较高社会结构的特殊内容。在激进的变革时代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需要开展出具体的历史方法，尤其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多维性、多要素性、替代性和非线性的辩证法。

（二）列宁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梅茹耶夫探讨了列宁政治实践，即如何将马克思思想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①] 农民的俄罗斯是落后的，而资产阶级的俄罗斯尚未出现，列宁通过马克思的辩证法解决了当时俄国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尤其是革命主体的确立，既不是农民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但是，为什么革命的无产阶级作为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却出现在俄罗斯，而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工人阶级国家中？无产阶级专政是怎样的？列宁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试图在没有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的情况下寻求对马克思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即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取而代之。列宁将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了独立的政治力量，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在“阶级”与“政党”的结合中，列宁把政

① В. Межуев: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2.

党放在第一位，从中看到了无产阶级从“阶级本身”转变为“自己的阶级”的主要条件。

按照列宁的思想，党的任务是向工人群众“灌输革命意识”。列宁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产生了严重分歧，导致其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尔什维克。随着该国革命情绪的增长，列宁的更深刻的想法变得清晰起来：把党的宣传者变成革命总部。列宁在革命中看到了一种特殊的职业活动，即“职业革命者”，在十月革命中列宁宣布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需要支持社会上最密集的人口层次，造成革命运动的群众幻想。为了证明世界资本主义链条在其“薄弱环节”中出现革命性“突破”的可能性，“突破”的工具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列宁主义是俄罗斯为获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而武装夺取政权的版本。

马克思生活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即政治现实化的时代，其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现实基础参照了欧洲的历史。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与恩格斯共同得出结论，即在民主秩序下工人不但可以通过革命获得权力，而且可以通过参与民主选举以和平手段获得权力。民主已经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可以用来实施社会主义改革，这个想法成为西方许多现代社会民主党派的理论基础。暴力在反对暴政的斗争中是合理的，但是却无法赢得民主，十月革命证实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舒宾反对将列宁的政治实践与民主化进程对立起来的立场，认为苏联模式的成功得益于布尔什维克所形成的最广泛联合与民间自治组织的发展。① 布尔什维克吸纳并引领各种左翼势力以及“外国”群众，建立共产主义政权 + 苏维埃社会的“共同体”，这便是十月革命的“遗传密码”：布尔什维克的现代化组合，即苏维埃社会主义理想与自我组织的人民政权。布尔什维主义不是宣布自己的共产主义政权，而是宣布苏维埃政权，这便是十月革命并不一致的两个面孔——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彼得格勒破坏管理核心，在当地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形成工农活动的自组织实践。在 1917 年底苏维埃建设对于积极分子而言意味着广泛民主，这是一种有限民主的形式。但与通常被称为“民主化”议会总统制不同，苏联体系在 1917 年后期并非精英主义，它基于高度的垂直流动性，挖掘来自社会底层干部的意见。然而，通过许多苏维埃积极分子集中讨论（包含少

① А. Шубин: Уроки 1917 года.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1.

数非苏维埃积极分子），其并非是在效率方面作出决定的最佳方式。面对严峻的社会挑战，在 1918 年春季列宁希望能够将基层积极分子和权力中心的创造性结合起来，然而这种关系是很难实现的，区域和中心利益也进入了冲突。

三、“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当代阐释

（一）后苏联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十月革命的内部论争

舍甫琴科认为关于十月革命性质的争论并不是发生在苏联解体之后，而是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的第一步，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最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就展现并持续开来。如果在改革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允许社会主义民主革新的可能性，那么在改革后期则完全拒绝这个机会。自由主义者认为苏联“现实社会主义”模式是不可改造的，所以不必“更新”它，而是完全放弃它，逐渐走向“真正的资本主义”。那些理论家早已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5 年后在公众意识中积累蓬勃的反共情绪，这自然导致了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和反苏联的彻底变革。舍甫琴科指出，当今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内部出现了分裂。在理论层面上，学者们依循不同路径独立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相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转向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关于十月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的争论，最初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和范围内展开的，一方面拒绝承认现实社会主义的存在，另一方面承认十月革命及其理想、目标，明确拒绝接受斯大林在 20 年代末完成的改革。然而，另外一种倾向很快形成了，即更加严格地评价布尔什维克及其所实现的十月革命，在根本上意味着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不同立场。舍甫琴科梳理了近年来俄罗斯学界关于十月革命的相关立场、观点。①

布兹加林在《1917 年革命：对 21 世纪的挑战》一书中提出了十月革命是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他特别强调，在不完备基础上成功发展社会主义萌芽的可能性，十月革命不能规约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难选择，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并未建成，最终导致恢复旧的体系，或者形成新社会的突变外观。按照科尔加诺夫的观点，十月革命仍然是同时展开的两次革命，但并不能

① В. Шевченко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в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 период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и после него.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1.

等同而论——凭借独特的工人阶级力量，第一次（早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外部形式有利于第二次（后来的资本主义革命）的发生。最终，在计划经济的外壳下资本主义集团的潜在形成、官僚集团摆脱工人阶级的制约，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历史学家、政治学家 P. 梅德韦杰夫的著作《1917 年俄国革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与失败》代表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立场，即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向不切实际道路的撤退，导致俄罗斯共产党和苏俄走向灭亡。斯大林在 20 年代后期放弃了新经济政策，其结果形成了效率低下、缺乏动力的极权—国家社会主义模式。

Е.Г. 普利马克和 И.К. 潘京深入探讨了十月革命、从改革期间到现阶段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等问题，认为十月革命是对 1917 年“国家灾难”局势的现实回应。但由于缺乏立即向社会主义转换的客观条件，继而便出现了苏联共产党、国家严重落后状况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尖锐矛盾。最终导致了历史的冲突。经济政策是十月革命卓有成效的延续，它开启了无产阶级革命向现实道路的转化，即建设符合俄罗斯具体条件的现代开放社会以及在农业国家均衡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可能性。问题在于，国家如何通过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模板和进步标准的文明形态复兴，即“为什么俄罗斯仍然处于虚构而非‘真实’的文明阶段”。

И.К. 潘京在新书《俄国革命：观念，意识形态，政治实践》中发展了上述思想。从政治权力转移到无产阶级政党手中来看，意味着在十月革命过程中社会政治向量发生了彻底改变。而从社会经济方面来看，十月革命必须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达到终点，几十年之内不会立即到来。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改造，甚至在列宁对其形式的表述中，客观上成为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方式，与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不同。西欧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构现代工业社会，而俄罗斯则是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通过赶超现代化创造向现代国家转化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形成了更强大的极权主义政权形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员形式建构并确立了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工业体系，但其是否与它的社会政治制度相适应？如果其既定政治秩序是极权主义，在 90 年代初俄国向资本主义的回归实际上是历史必然。

基于上述观点，舍甫琴科指出，俄罗斯社会主义不能按照欧洲标准在社会和政治实践中获得相同的具体化。但是欧洲社会主义，即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并非唯一模式。如果以资本主义成熟发展阶段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为标

准，在走向社会主义之初俄国并不具备必要的前提条件。然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越来越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伙伴，如今跨国金融资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权力，在西方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循序渐进地向社会主义进化的可能性根本无法现实。

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社会主义学会(РУСО)汇集了Р.И. 科索拉波夫、Ю.К. 普列特尼科夫、В.С. 采缅诺夫、В.В. 特鲁施科夫、Ф.Н. 科洛茨沃戈等知名学者的思想，与欧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即捍卫十月革命的必然性，承认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地位。俄罗斯社会主义学会（РУСО）在今天仍然积极保护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更多关注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发展了世界体系分析方法。

Б.Ю. 加加利茨基是将世界体系分析方法运用于俄罗斯历史研究的第一位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通过外部和内部原因的紧密结合，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在帝国主义体系最薄弱的环节如何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列宁看来，俄罗斯比任何其他西欧国家都具备创造另一种文明道路的主要先决条件及其可能性。革命本身，转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政府，是世界体系危机以及俄罗斯统治精英垮台的结果。

А.И. 弗勒索夫认为，十月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为俄罗斯政权建构了充分的理论根据，即不断地对抗私有制，作为一个历史的断裂，十月革命（或者说1905—1933年俄国革命）依循俄罗斯民族自身的历史发展逻辑完全是自然的和连续的。表面上看，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和共产主义政权的建立使俄罗斯远远疏离于欧洲。然而，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反抗专制制度，终结了俄罗斯的暴乱，致使政府解体（在部分国家），反抗资本主义，而且这场革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即欧洲现代化的左翼方案之下实现的，它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十月革命使俄罗斯转向了超越欧洲的左翼化道路，并且转向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开启了大规模反抗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现代化道路。苏维埃国家的出现阻止了世界金融资本对全球的征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从根本上敌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因此，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不断增加。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内部对十月革命的阐释是存在分歧的。承认1917年十月革命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具有世界历史开端意义的学者，通常被称为正统的共产党人，坚持并继续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涉及俄罗斯问

题，要特别关注其历史与文明的特征、十月革命的民族性和文化特殊性。毫无疑问，十月革命仍然具有伟大的世界历史意义，苏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国家的历史传统具有较强依赖性。这一问题的讨论开始于苏联改革结束时期，具体涉及俄罗斯身份、俄罗斯心态、俄罗斯持续上千年的国家主义和俄罗斯历史—文化洗礼的后果等问题。

（二）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

舒宾立足于沙皇俄国现代化改革与资本主义道路转向的内在困境与外部矛盾，通过诸多历史细节以及关键性要素、内在趋势的矛盾分析，指出 1917 年两次俄国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对于俄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当代阐释与价值评估恰恰源于百年跨度之间社会转型的相关性。[①] 舒宾认为，工业现代化进程中避免出现爆发式革命的前提在于，形成统治阶级中的精英改革派，不仅能够展开渐进式、精细化改革，而且还能够克服统治阶层自身的狭隘性，英国、法国等自由派精英们依靠渐进革命将资本主义发展权交给“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爆发的积累性矛盾早已在 20 世纪初俄国“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化工业文明过渡”中就开始酝酿，统治阶层的贵族官僚特性造成了与精英阶层之间的冲突及其对改革的拒斥与抵制，即便俄国 1905—1907 年改革也是建立在维护专制统治和土地占有制基础上的，并进一步成为俄罗斯现代化的障碍。因此，1917 年革命的重要教训在于，如果政府不能够“化解”社会危机，那么爆发式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第一，“劳工问题”已经在 1905 年被提上了工业现代化议程；第二，战争加剧了城市地区的社会危机，城市仍然处于落后的、脱离社会的边缘化地位，1905 年和 1917 年的革命始于城市，士兵参与到革命进程中。工人阶级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形成了密切关系，不依赖于自由主义阶层而准备独立行动，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没有战争，强大的革命组织也已经在酝酿和形成之中，以不可逆转之势不断向内部深入。

舒宾同样主张二月革命向十月革命转化的历史必然性。由于俄国统治阶层无法充分应对 1915 年至 1917 年初形势的挑战，随之而来的保守主义专制政策导致了自由派与其分裂。二月革命（作为俄国大革命的初期阶段）成为下层群体动乱、士兵起义和自由动乱的复合体。革命为自由派掌握权力开辟了道路，同时意味着革命有机会超出自由主义的目标而继续深化。然而自由派既期

---

① А. Шубин: Уроки 1917 года.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1.

望下层起义为政变创造条件，又无法对革命力量进行组织和控制，因此二月革命作为以政治精英自由政变的革命形式，从一开始就获得了深刻的社会革命性质与向内部持续展开的可能性。虽然自由派希望稳定局势从而将全部权力交给临时政府，然而却低估了革命一经展开便不断释放的潜能，由于军队参与了下层革命并受到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控制，这就使自由派建立资产阶级独裁政府的意图无法实现。就此而言，建立一个广泛的社会自组织机构网络，特别是苏维埃，成为 21 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切合现实的历史经验。

二月革命导致了“双重权力”，即政府与苏维埃之间的权力分割与矛盾对抗。自由派及其与之接近的温和社会主义者采取的扩大公民自由的措施几乎没有进入社会生活，在与沙皇专制政权争夺权力时自由派赞成建立对议会负责的政府，然而在临时政府上台后却剥夺了杜马的权力。当自由派的纲领无法满足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与土地诉求并且只能施加武力镇压时，反而削弱了自由主义政变的取得胜利的可能。在城市地区社会危机加剧、农民获得土地需求强烈的情况下，通过更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方案对二月革命进行补充呼之欲出，出现了将苏维埃转变为来来社会政治体系一部分甚至全部基础的可能性，并表现出成为俄罗斯人民政治权力的强大革命潜力。二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立场及其道路选择表现为三种可能：右翼社会主义者，实际上代表联合政府利益；从右派布尔什维克到左派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的中间派、社会革命党中间派；左派激进分子，即布尔什维克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在苏维埃的支持下全国各地出现了基层社会的自组织活动，数百个群众组织转向自治。当临时政府正建立（或承诺）“民主”机构时，底层阶级已经愿意服从苏维埃，从而稳定了革命的社会秩序。布尔什维克成为工人阶级运动，以及激进的城市底层阶级，即农民和知识分子等边缘化群体的领导者，广泛的联合与民众自治组织的动员，使布尔什维克领导核心获得了技术上的统治力量，决定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在革命和内战中取得胜利后的战略。布尔什维克在内战、镇压其他威权主义时没有遇到障碍。这不仅使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情绪高涨，而且使跟随布尔什维克的群众情绪高涨。社会革命先锋队的激进运动反对其他有影响力的政治（包括国家）力量，破坏了建设性社会变革的先决条件。1917 年的教训是需要建立一个左前方，一方面依靠大多数人的支持，另一方面排除破坏社会变革的政治障碍。布尔什维克代表了狭隘的社会政治谱系，但

苏维埃政权观念的普及使其并非依靠党派中心管理，而是依靠广泛的基层激进运动，从而能够以最广泛的政治动员开启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社会。

舒宾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看到克服战争和复兴经济的出路，即获得俄国社会最有活力的一部分积极分子的支持，而并非依赖大多数人，虽然其所建立的最广泛的联盟在社会态度和目标上是异质的，然而激进的社会变革愿望将其联合起来。按照列宁的计划，必须摧毁障碍、创造民众基础，即包括城市下层阶级（不一定是无产阶级）以及农民和知识分子，将更多的俄罗斯人吸引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十月革命标志着俄国革命新的阶段的开始，其特点是过渡到激进的社会变革在全俄范围内建立苏维埃政权。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去革命性的重要原因在于，走向集权主义并压制了民众的自治原则，而后者恰恰是十月革命获得胜利的主要力量来源。苏联模式具有其必然性和历史意义，十月革命激发了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与创造能力，成为统治精英不想或不能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社会冲突的象征，其精神核心是人道主义和人民民主。这种对抗形成了苏联历史和文化的内容，并延续至今。当下俄罗斯的局势与困境意味着苏维埃文明仍然活着。

（三）十月革命性质的当代评价

梅茹耶夫要求以俄罗斯现代性转型的长时段历史周期来定位十月革命。从 1905 年以来的 12 年中俄国发生了三次革命，第一次革命以失败告终，而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不过是以 1905 年为开端的统一革命进程的后续阶段，十月革命以更为激进的方式承接了二月革命，但却并未真正解决自身的任务，即实现从专制政体到民主政体的过渡。① 梅茹耶夫认为，向革命提出道德诘难是毫无意义的，首先需要确定关于革命的总体态度，理解其历史展开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革命暴力浪潮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革命的民众的社会构成，就十月革命所依赖的革命主体而言，可以迅速摧毁旧秩序，却很难用新秩序取而代之。俄国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迅速发展成为它的反面——反资产阶级和反民主主义革命。在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里不可能以迅速革命的方式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布尔什维克执政恰恰是俄罗斯传统非民主性质的后果，由此而产生俄罗斯历史上的两个未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农民。大部分俄国农民生活在共同的父权制村庄的条件下，成为现代化国家甚至

① В. Межуев: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2.

专制权力是阻碍。布尔什维克纯粹用俄国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即“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农民的俄罗斯来说，正是通过压制抵抗来完成工业化的。第二个问题是国家。以保持国家完整性为目标的苏联创建经验并没有实现民主，所有核心功能都是由执政党承担的。

在十月革命前没有一个党派能够在这个农民的国家找到解决民主问题的路径。只有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对实现这一目标采取了纯粹俄国式的办法，即只有不在根本上触及这个农民国家，才有可能比任何民主改革得到更多的理解和赞同。这一策略使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以及内战中击败对手，虽然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但这一名称并不能说明其胜利的真正本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体制并不是简单地恢复旧秩序，而是在缺乏自由的情况下走向极权主义，革命暴力并不是争取民主胜利的最佳途径。它可能会变成更多的暴力，这是十月革命所证明了的。

沃耶伊科夫则明确反对将二月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定性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性观点。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只有当必要的物质条件成熟时，才会出现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上只能发生在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 20 世纪初俄国特殊的社会经济体系，十月革命自身的实践任务是模糊而且矛盾的。① 虽然在苏联时期许多历史学家试图证明，20 世纪初俄罗斯是一个资本主义获得平均发展水平的国家，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虽然其并未占据主导地位。然而，沃耶伊科夫认为有必要区分工业化发展与资本主义进程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两个过程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后者是前者的结果，由此资本主义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应该落后于工业部门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俄罗斯只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标主要是克服封建主义。因此，需要对苏联时期所界定的两次革命，即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十月的社会主义革命提出质疑。这些阶段可以按时间顺序和历史进行区分，但在政治上或就其性质而言，1917 年两个阶段合并为一次俄罗斯大革命。革命分裂为具有相反特征的两个方面，就理论而言，从二月到十月的八个月时间里，俄罗斯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到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经济条件的水平。在国外研究文献中已经确立了将 1917 年二月与十月解读为统一俄国革命的传统，并且越来越多地打破了苏联所形成的定论，这意味

① М. Воейков: О характере Велико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2.

着需要重新思考俄国革命的性质。如果有一次革命，那么其性质（本质）也是必定是统一的。

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措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司徒卢威总结“资产阶级化”劳动过程和“军事化”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最深刻、最内在的矛盾。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诉诸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由生产和劳动组织的资产阶级原则所主宰的经济体系。这个阶段实质上是实现了完成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功能，整个俄国革命其目的和推动力量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原因在于：第一，20 世纪初俄国无产阶级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根本没有必要谈论无产阶级革命；第二，社会主义革命缺乏足够的物质和历史先决条件。总的来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缓慢，在绝大多数人口就业的经济的农业部门几乎完全没有；第三，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短暂时期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第四，革命只导致了封建社会的瓦解；第五，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于革命本质的解释模糊；第六，革命后期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以一种奇特的形式）的统治。因此，认识到俄国大革命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就必须认识到它的整个资产阶级性质。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在一年内实现两个基本上不同的革命是非常荒谬的。

布兹加林就俄国革命的性质讨论了三个问题，即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吗？是反资产阶级革命吗？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过渡吗？[①] 由十月革命所开启的对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即共产主义道路的现实探索，是一个不间断的、非线性和不均匀过程，尽管过去十年出现一系列失败和退缩，但它仍在新世纪中继续存在。苏维埃文化所形成的新的社会时空是一个世界进程的展开过程，不仅包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且其潜在力量渗透并影响着世界上的所有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化恰恰是革命的结果。然而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受到来自于自由主义的挑战，沃耶伊科夫以俄国并未形成无产阶级否认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工业化、城市化、教育等）。斯莱文强调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发展了国有经济形式，形成了人的新的生存方式、自我意识觉醒等。但是在布兹加林看来，仅仅证明革命本身以及苏联体系中包含着新共产主义的真正萌芽，来反对以沃耶伊科夫为代表的立场

① А. Бузгалин Октябрь: оптимизм трагедии（к дискуссии о природ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2.

是不够的。

布兹加林认为，证明十月革命真正内容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今天尤为重要。根据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众所周知、已被证实的论点，社会革命的主要标准是大众社会创造力的觉醒，其改变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体系和权力的性质。十月革命确实成为底层阶级创造力的结果和源泉，旨在消除资本和资本主义异化关系，解放公共生活领域，开展出共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实践；在经济领域中，不仅建立国有企业（列宁指的是过渡，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也包括公社、真正的合作社、长期的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核算和控制等；在政治上形成了苏维埃与新的大众公共组织和运动；提倡新的社会参与方式，即所谓基层民主；在公共生活和文化中消除文盲、技术、体育运动和艺术团体。

社会生活的多元化以及政治体制的日益官僚化是苏联体系根深蒂固的矛盾，通过社会创造力的激发解决了资本主义革命范围内（从电气化到群众基本素养）的整体问题，并形成了后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即由新的行动者以新方式（协会）和新活动（团结、集体）相互联系的新人（就其价值观和动机而言）的创造活动。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十年实践中社会主义革命体现在：底层阶级的创造活动唤醒了新的生活；音乐性和节日性的庆典；社会时间的加速以及社会空间的压缩与开放。十月革命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化过程，显然具有后资本主义性质。

布兹加林认为十月革命的成就在于以非资本主义的方式解决了早期资本主义的问题，并形成了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巨大成就体现在对于现实问题的破解方式上：在经济领域所实现的，与其说是资产阶级工业化（主要面向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不如说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生产方式，广泛挖掘人的创造潜力的工业化成就，先进的科技革命（基础科学和教育）；生产力的半突变的社会主义进步形式；面向全社会的普及高等文化教育（教养和教育的统一）的进步，即一个半（突变）社会主义文化；超越资产阶级民主提供了更为高级的基层民主或人民民主，真正体现了社会创造力。

布兹加林同样认为，拒绝以辩证法评估十月革命是不合理的，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矛盾在于，如何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任务。因此最困难的问题在于，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能否实现后资本主义的任务？十月革命与斯大林的恐怖和勃列日涅夫的停滞相反，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和活动形式，人类行为、价值观和生命力活力、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活动动机。苏联解体时

耗尽了十月革命所产生的社会创造活力，革命的真正辩证法在于：破坏和创造的平衡是非常波动的。

布兹加林认为，回应十月革命性质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其是否反对“资本”的革命？理论的关键在于如何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主要是劳动与资本的正式和真正的从属关系理论。在革命性过渡创造性不足的条件下，有可能“完成”新社会的先决条件。在物质基础不充分的情况下推进发展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和要素至少有以下几点：第一，通过新的社会形式及其方法，制定和实施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战略（在物质生产中建立发达的技术基础、确保人口的合理消费水平）；第二，根据大众创造性活动领域的优先顺序，应对新社会的挑战、满足大众需求，而不是模仿军国主义、金融投机和大众文化等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优先发展教育、健康、文化、科学、娱乐等，通过提高人的素质以及创造性活动水平推进新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形成；第三，通过强大的社会创造力（“热情”），形成正式的解放性劳动关系，弥补物质和技术条件不足；第四，文化优先发展构成了对物质和技术基础发展不足的补充；第五，在混合经济制度框架内向自由王国过渡的阶段，是新的社会阶段尚未形成条件下“旧”的社会经济组织的最发达形式；通过足够的社会力培养和创造新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新旧形式的比例变化很大；第六，基本民主形式（公民社会的社会主义）是实现上述所有过程的绝对必要条件。

布兹加林认为，不幸的是苏联社会和政治条件不利于解决超出自身发展能力的任务，没有解决技术发展和消费增长问题的非资本主义形式（仅仅部分在教育、基础科学、文化领域有一定进步）。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革命力量的使命和责任在于为以处于革命过程中的新社会形式提供的发展要素，然而布尔什维克在政治政变后未能坚持上述“完成”革命先决条件的路线。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先决条件的“前提”，即新社会诞生的基础不足而无法实现（或者客观上不可能实现），它不可避免地退化为反革命，导致恢复到前一制度，或导致新的社会突变。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倾向之后出现的“领先”突变，“过早”地创建一个新社会，就俄罗斯帝国的资产阶级转变而言，更准确地说是“滞后”资本主义。后者的产生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运动开始得较晚和缓慢，被统治阶级人为地停滞，进行得不够激进，半改革主义的方法导致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专政。突变的错误在于，第一种情况下革命者过于敏捷而且过于激进，第

二种情况下革命者过于软弱，而犹豫不决。革命中的客观和主观的辩证法要复杂得多。如果十月革命失败，整个世界将面临法西斯主义全面胜利的威胁。

布兹加林认为需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在于，一场革命是否能够和平并以民主的方式发生？首先，十月革命实际上赢得了和平与民主，苏联社会主义摆脱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与群众社会创造性实践之间的真正矛盾，革命的真正基础是自下而上的大众需求，革命前夕工人和士兵代表的群众的要求比布尔什维克本身更为激进，十月革命是苏维埃赢得和平与民主的历史。其次，20 世纪展现了左翼在议会或总统选举中和平胜利的许多例子，然而必须区分内容——作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体系（社会秩序）的质变的革命——以及这种变化的政治形式。 同时区分政治革命和政治变革也很重要。十月革命的主要价值在于社会解放的强大冲动。

四、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当代反思

（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民主建构及其内在矛盾

舒宾将十月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归结为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广泛联盟以及基层民主。然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展开及其所遭遇到的内外困境，使其不得不开启另外一条自上而下的道路，即从企业集体化和广泛自治(从下面）或（和）整个经济社会化过渡到单一计划（从上面）经济运行的单一系统，然而布尔什维克却无法实现两条路径的平衡与协调，如自组织、工业民主与中央计划、集中管理。① 即“顶层”与“底部”、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调控与直接管理之间的平衡、民主与监管的问题凸显出来。

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要求迅速实现整个行业的社会化，形式上民主可以存在，但社会必须按照单一计划发展。社会的自发力量，即自下而上的运动被认为是导致混乱的根源。但劳动人民的热情成为社会革命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并且只有劳动人民的主体性被充分尊重，无论是在生产过程还是权力组织中才能够转化为积极的推动力量。由此可见，民主从精英领域转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日常生活、社会化生产等方面的重要性。自组织和基层民主（真正的民主）被证明是改变社会条件的人类力量来源。但是在舒宾看来，下

① А. Шубин: Уроки 1917 года.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1.

层阶级的力量既可以是建设性的也可以是破坏性的，一切都取决于人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能否使民主真正得以显现。

在舒宾看来，为了使新的社会主义体系避免陷入不可逆转的官僚化进程中，应该形成一系列平衡：第一，国家机构的经济权力（尽可能窄，主要是仲裁和投资）与其他经济行为体，如集体、合作社、私营企业家之间形成平衡。第二，行政权力与工业民主机构之间（根据明确的程序选举产生，并有可能召回成员）形成平衡，保障企业避免资本外逃的决策能力，保障每个社会团体的利益及其功能的实现。第三，在生产者、消费者和居民利益之间形成平衡。以消费者和居民的自我组织、国家对某些行业的必要垄断为前提。第四，工作群众的利益与创造性少数群体如知识分子和专家之间利益的平衡。这两个层次对于生产和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能以大多数人的平均主义抑制少数人的发展优势（在“大多数”的背后通常有官僚精英支持）。第五，在地域和民族之间实现平衡，旨在维护共同空间，由地区代表组成的机构共同形成国家层面的决定，参与中央管理，通过民族文化自治将民族文化冲突降到最低程度。上述平衡管关系原则上蕴含于苏联政治体制中，通过工人参与和控制行政管理建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寻求中央政府机构与地区区域之间的权力分配。然而，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却使上述平衡关系日趋断裂、瓦解并走向对立。

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试图寻找平衡点，一方面通过全面集中化，使各级严格从属于权力中心；另一方面厘清权力边界并寻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妥协，既有利于自治管理，同时也抑制更广泛的群众抵抗。上述方向的努力既有利于赢得战争，又可以部分实现工厂现代化，然而却没有使社会主义苏联真正走上现代化道路，很快便拒绝采用平衡模式代之以完全集中的超级国家模式，放弃了最初的社会平等与民主目标。20 年后，社会主义苏联形成了严格的官僚等级制度，并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立，然而其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苏联工业化社会变体的高效率、官僚化的特点与资本主义变体相比具有其优点和缺点。共产党领导人放弃平等、民主和自组织的社会主义原则，突击追赶工业任务，十月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被国有工厂的严格管理框架所取代。但与此同时，十月革命的理想得到了保存和支持。

苏联社会主义致力于共产主义的利他主义和没有阶级分化的社会、民主和自我组织、社会保障和劳动者的充分权利。十月革命的形象仍然是苏联社会

主义文明最初原则的保证，成为统治精英不能通过和平手段治愈社会冲突而导致自我终结的象征。由于极权主义框架和苏联社会主义传统的内在斗争构成了苏联历史和文化的冲突性内容，而它的核心仍然是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但开启于十月革命的苏联文明仍然具有生命力，对苏联人民来说，它是“为了人民的和平”、为了工人的工厂、为了苏维埃的权力、为了农民的利益，与“权力—自治，苏维埃”融合在一起。

布兹加林在《十月革命后的 100 年：市场和民主，平等和自由》一文中重新指出了关于十月革命的迫切问题，即它开始的原因，以及在俄国现实条件下结束的特点。这一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现象，是俄罗斯群众朝着进步和民主的第一步，区别于现代的“颜色革命”，目前商品市场“企业资本的拟仿和竞争”不仅破坏了许多中心和外围国家的民主，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的普遍衰退，充满战争和全球冲突。①

（二）苏联解体的当代研究

舍甫琴科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了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原因，认为正是戈尔巴乔夫将苏联共产党逐渐转变为社会民主党。他公开谈论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和解的必要性。阐明在后苏联社会思想领域中围绕十月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所展开的学术争论与意识形态斗争，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改革以来所释放的多元化意识形态在各个阶层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动荡和混乱。因此，仅仅说明被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想和观念主张是有局限性的。显然，上述分裂在很大程度上依循具体的条件。在每一思想方向上都凸显出独立的立场、细微的差异和转变。②

就改革第一阶段而言，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仍是学术意义上的争论，他们寄希望于苏联国家，许多后来的自由主义者是苏共党员。但是，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上述争论并非处于共同的理论界限之内，而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立场冲突。在思想理论上直接对立的学者们不可能展开富有成效的科学对话。因此，从改革的第一步开始，便展开了持续至今的激烈思想斗争。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报告《十月和

---

① А. Бузгалин Демократия. Свобода. Революци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правому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у и неолиберализму есть!（уроки Февраля 1917-го）.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1.

② В. Шевченко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в марксис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 период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и после него.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1.

改革：革命在继续》表面上以传统马克思主义为核心，但令人警惕的是，其将改革等同于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依循自身逻辑和发展阶段的漫长过程）。革命仍在继续，这是戈尔巴乔夫的立场，也是苏联共产党关于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立场彻底转变的开始。将改革误解为一场真正的革命，其后果是惊人的，意味着某些社会力量将通过改革重新获得和攫取这个国家的政权。

恰当地说，改革对苏联社会的破坏，并没能随之建构强有力的、目的明确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改革过程以及 1991 年 8 月可耻的结果表明，其结局并不取决于发起人的主观意图，客观上导致了苏维埃社会制度的瓦解，使国家陷入混乱。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让渡”给了在这场混乱中积累政治力量的反社会主义势力。1988—1991 年，戈尔巴乔夫经常转向列宁思想。在戈尔巴乔夫及其追随者积极的、自觉的支持下，党内对苏联社会主义缺陷展开批判，继而大量虚构和臆造事实，迅速转向抹黑以及彻底否定苏联时期的国家生活。直到现在，这仍然是个谜：在改革过程中，公众意识的反共情绪经过五年时间的积累和扩张，如何使忠诚于共产主义信念的布尔什维克党彻底转向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苏联的极端。现实的社会主义失败后，苏联中央政治局、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雅科夫列夫（1985—1990）为推动改革力量的观念转变制定了明确的方法论计划或“思想路线”。1986—1991 年，公众形成了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的不同评价和态度。从改革开始，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再是统一的意识形态，随着改革的深入，不同的思想观念处于彼此的对立和冲突之中。

1986—1988 年，开展了“回到列宁”的广泛讨论，即恢复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回到列宁”的口号被公众认同，而斯大林歪曲了列宁的观点。直到改革结束，这仍然作为苏共的官方立场。当改革的设计师雅科夫列夫试图将热情转向列宁的时候，局势严重恶化。一部分学者和政治家努力捍卫十月革命理想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列宁主义思想，而另一部分则对十月革命和列宁展开了更进一步的批判。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是戈尔巴乔夫宣布公开性和自由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但是，坚决地向人们推行多元化意识形态的目的不是为了探寻真理。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迅速积累，抛弃了苏联历史时期积极有益的经验、十月革命的理想以及社会主义成就。改革结束后，这种意识形态更具侵略性，1991 年 8 月成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官方意识形态。

（三）斯大林主义批判

1988 年末至 1989 年初，哲学家 A.C. 齐普科发表了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起源”系列文章。他以社会民主主义抨击列宁，以道德说教抨击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思想。A.C. 齐普科的文章“是完全反对和排斥苏联历史经验的开始”。斯拉文承认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但却强调斯大林是列宁革命和事业的掘墓人。苏共 20 大的指导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将原生的社会主义扭曲为斯大林主义理论与实践。几乎所有学者对斯大林一致持否定态度，认为他是反革命并创造了极权主义。不过，斯拉文在这个问题上持温和立场。他认为，极权主义是政体权力的特征，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带有双重性质，这场斗争具有两种趋势：民主的和官僚的。”[①] 关于斯大林，斯拉文强调，苏联制度的基础仍然被保存下来，不能无视苏联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数百万人的革命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

随着全球化与俄罗斯环境的恶化，有关斯大林在苏联社会历史和生活中作用的讨论再次开始。一些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试图在国家生活中阐明斯大林的积极作用，甚至试图尽可能恢复对其个人崇拜。相反，其他人则表现出对斯大林政策的罪恶、暴虐和非人道。还有一些人试图证明这种政策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非人道主义特征以及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直接联系是合理的。上述背景下《抉择》刊载了 C. H. 马列耶夫的《对斯大林主义的自由和民主的批评》，目的是澄清这一政治现象的社会性质及其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列耶夫尖锐地批判了 A. C. 齐普科的哲学和意识形态观点。多年来，A. C. 齐普科讲述了前苏共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到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和宗教的演变，而今天这些演变实际上是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即 A. C. 齐普科看似以真正的“共产主义思想”批评“斯大林主义”，然而在他的指导下，雅科夫列夫借助于列宁批判斯大林，继而借助于各种“社会主义者”批判列宁，然后借助于自由派批判“社会主义者”，借助于俄罗斯宗教哲学颠覆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

《关于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一文反对齐普科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自由主义立场，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斯大林主义起源的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以当时实际的社会生活状况为出发点理解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从纯粹的意识形态原因中分离出真正的现实基础。齐普科认为，

---

① A.A. 索洛金：《1917 年革命：对于 21 世纪的挑战》，莫斯科，2009 年，第 112 页。

从农民是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持群体这一事实来看，斯大林主义是“父权制煽动性意识形态的产物”，当其社会基础出现问题时，不能仅仅由“斯大林”这个符号来承担全部责任，农民灵魂中的二重性可能会在某些条件下成为悲剧。齐普科否定农民进行革命的可能性，将斯大林主义的客观基础归结为主观要素，试图将我们拖入人类潜意识的黑暗深处。正如格洛别夫所说，“斯大林主义是基于神话的，但事实上，已经有了一个相反的反斯大林神话！斯大林被赋予了恶魔的特征，他是绝对邪恶的化身，因为这是他的本性。试图找到斯大林主义的客观先决条件有时被宣称是为了辩护。”对斯大林主义的客观解释的任何企图都会引起敌意和混乱。事实上，他要解释和证明同样的事情。列宁很好地解释了左翼极端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起源，但是否证明他为两者辩护呢？相反，当我们开始寻找斯大林主义的群众革命热情在“自私”、“思维结构”上的根源时，却视而不见这一现象的真正原因。正如齐普科所认为的，如果人的自私和愚蠢是无法根除的，那么斯大林主义是无法根治的。在齐普科看来，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不是拥有特权的过度繁荣的官僚机构，而最重要的是农民的非理性。如果没有与自由主义划清界限，那么在批判斯大林主义方向上就无法进一步发展，就不可能巩固民主力量。

自由主义在方法论上拒绝客观的阶级分析方法、无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对历史的理解中，自由主义第一次出现为进化论者，相信持续稳定的进步。在确定历史演变导致了“渐进式的突破”和革命之后，自由主义者不再相信自然的历史进程，并且陷入道德冲突。自由主义者对于历史“进步”感到失望，善和历史规律是不相容的。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不仅带来了文明，而且还产生了“恶之花”、血腥战争、饥荒、疾病、侵略、蒙昧主义等。自由主义者开始批判客观主义的历史原则。它是从抽象的善的原则的角度对历史展开道德批判，并赋予历史以主观主义的道德说教。自由主义者犯下双重罪孽：他使斯大林主义被洗白，并将责任置于革命工人运动之上。两者之间的“特征”完全模糊。

革命实践首先是群众的自发解放运动，俄罗斯社会底层不可避免地将无政府状态、过度暴力置于自发的革命运动中。齐普科没有区分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认为斯大林主义以某种方式保持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此，齐普科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其革命的辩证法，这个灵魂首先遭到了阉割，作为革命思维逻辑的辩证法在“一般社会学理论”中被转化为抽象的教

条。如果我们想要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必须能够自我反思和批判，道德化批判是一种纯粹自由主义的抽象空谈。自由主义批判斯大林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其典型方法是将一般革命意识形态等同于斯大林主义。按照齐普科的方法，批判斯大林主义者就必须拒绝相信自然的历史进程，拒绝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崩溃以及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在理论和实际上，斯大林几乎从未实行与中农合作的政策，拒绝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里革命暴力针对富农，反革命转向暴力侵害中农和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人。通过批评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主义的深刻目的在于转向欧洲类型的官僚体制。简单的道德化并不能澄清事情的本质，反之亦然。 因此，拒绝斯大林主义，但同样拒绝了自由主义。

五、晚期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危机与替代性选择

布兹加林认为，虽然俄国革命终结了俄罗斯绝对君主制统治，但却没有为自由与民主构建稳固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反而使问题本身不断恶化。关于革命作为实现社会发展质的飞跃问题的讨论也变得更加严峻，因此有必要再次提出自由、民主、革命问题，从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中澄清革命的理论与实践。①

在布兹加林看来，革命、自由和民主在新自由主义中必然陷入僵局。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区别于政治动荡）在于劳动人民的社会力量发生了突变，导致社会经济体系及其政治意识形态形式的变革。因此，社会革命总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运动，这条道路是辩证的否定，即扬弃必然王国（异化关系）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真正人类历史的开端恰恰是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结果。十月革命使我们向自由王国趋近，然而社会解放和新的创造活动必然以破坏性的、摧毁性的方式为自身开辟道路，即社会解放的非线性过程（在质、密度和广泛性的变化上相统一）可以被把握为社会的解放程度。社会革命是客观矛盾的产物。晚期资本主义在“中心”和“边缘”国家之间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问题，并成为对传统民主原则的挑战。普通公民

① А. Бузгалин Демократия. Свобода. Революци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правому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у и неолиберализму есть!（уроки Февраля 1917-го）.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 1.

和精英知识分子越来越怀疑民主的绝对价值，倾向于保守权力话语。因此有必要找到一条出路，拒绝简化民主原则和自由民主的价值，而且使其可以从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转变为现实的人民民主，从消极自由转变为人的社会解放。

布兹加林认为，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不应该遗忘市场和资本构成了自由和民主的基础。普通公民实现其政治权利的主要限制在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在政治形式上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然而政治参与过程中经济上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市场与资本依循既定体系的框架建构是巨大而坚固的、不可消除的公民政治参与过程的不平等，隐藏在民主形式背后的资产阶级的真正力量，即资本霸权。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延续至今，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家所捍卫的基本立场：古典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竞争关系占主导地位，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不仅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形式，而且捍卫财产占有者的政治权利。通过引入简单的机制，即在政治参与进程以财产资格作为获得政治权利的最充分条件，大多数人仍然更加倾向于“市场经济”的自我组织与平等化功能，政治进程的控制仍然在资本霸权的手中。资本所有者保障现实的经济和政治权利、控制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保障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政治和法律前提，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古典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形式上保障雇佣工人即劳动力商品所有者的平等权利。现存形式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发展不够充分，尤其对于替代资本霸权而言。然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形成社会解放制度确立了形式的基础：言论自由可以形成和扩展左翼思想、世界观、理论方法、教育等。

公共组织的自由活动旨在解决社会多元化所导致的互相排斥，从而捍卫工薪阶层的利益、促进就业、薪酬、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文化发展等；政治活动的自由为左翼政党组织参与议会活动提供了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实质性地参与政府活动；最高权力机构的选举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内容等方面，都会带来和平变革的潜力。然而上述形式意义上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面临着资本霸权的阻力，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所有基本制度都服从于这种霸权。但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对于所有工人而言是开放的，通过摆脱全面异化世界的社会解放运动以及工人的社会创造性活动对抗资本霸权。因此，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在于，谁支配谁。他们支配我们，利用资本的经济力量使所有的形式民主机构从属于自身利益；或者我们支配他们，

发展群众性和组织性，通过大多数人的社会创造性力量，在形式和现实上真正支配资本。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了古典资本主义时代的力量对抗，资本是形式主义平等的拥护者，但是真正的民主或人民民主，工人阶级作为大工业生产的自由联合，只能通过强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工会、社会主义政党）够维护其自身利益。

布兹加林进一步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莅临意味着市场与资本不再是自由和民主的基础。资本主义的衰落阶段，20 世纪末全球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极大地改变了市场的本质、资本积累方式以及政治机制。依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把握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中的矛盾性转变，晚期资本主义的目的在于优先发展媒介、军工企业和大众消费。一个世纪前列宁指出商品生产关系的主要变化在于，大型高度集中的资本首先在当地获得调节和支配经济关系的能力，使消费者及其分包商从属于自己的市场权力（政治经济学家称之为“不完全规划”），这导致了自由竞争被破坏但并未被取消。20 世纪末以来，这种破坏已经演变成通过操纵企业垄断联盟实施对经济空间关系体系的控制；垄断资本与国家的联合开始；近几十年来市场已经全面扩张，商业贸易的范围不仅包括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还包括社会政治参与过程、教育、科学和文化、个人生活及其空闲时间，上述被形式化的领域不仅服从于市场条件，而且服从于垄断资本的力量；在市场中，距离商品满足需求的、真正的消费价值越来越远，确证人类素质和技术进步的商品成为拟仿，被销售和购买使用价值的标志所取代。就资本的性质而言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垄断，其主要经济力量属于公司，它控制的不只是股权，而且是真正的所有权。通过关键决策、人员控制、财务和信息流动、与国家机构沟通等，保证真正的财产权利。上述实质性转变也影响了剥削关系，转为复杂系统，资本不仅侵占了工业的剩余价值，而且还包括知识分子的剩余价值，即剥削创造性劳动者，跨国垄断资本利用边缘和半边缘国家以虚拟金融资本剥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同样重要的是，随着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对于资本在形式上的以及实质从属关系上的发展，现代垄断资本再生出人的空闲时间对资本体系的从属关系体系，并且试图将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学习和友谊、婚姻和家庭试图转变为价值自我增值的过程。

一方面发展起来的是市场—资本主义体系巨大的社会化进程，20 世纪中期以来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之社会民主改革构成该体系转型的重要因素。首

先，所有制关系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质变：社会民主主要是在分配关系中进行干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一般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降低了社会不平等水平并增加了社会保障），不涉及私有财产与权力关系，两者都在垄断资本及隶属其下的最高国家官僚之下。这些变化（工人在财产和管理中的部分参与，扩大公民社会组织的权力等）远没有分配关系的变化深刻。第二，上述事态发展并非资本主义的高尚意图和非正式民主程序的结果，而是劳动人民（主要是与左派知识分子结盟的工业无产阶级）以各种形式进行艰苦斗争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这种妥协的胜利与资产阶级民主化的先进形式直接相关，在这种模式胜利的年代为积极发展工会和其他反霸权民间社会、为激活左派知识分子和提高左派思想在公众意识中的影响开辟了道路（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和意大利）。然而，社会民主主义改革只影响了资本主义世界中少数的“中心”国家。第三，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上述成果逐渐回归起点，由于垄断资本直接和间接的操纵性影响，主要民主机构开始积极商业化和退化。

上述过程的结果导致在“中心”国家向社会不平等退化。社会和经济领域中上述纯粹的非线性变化对于政治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取代资本所有者掌握实际权力的民主，但确保相对平等和保护私人所有者的权利，因此对这些所有者来说是理想的和必要的，在很多方面来说形成不同的政治机制。首先，即使从形式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民主”已经不再是公民（国家的所有者）的平等权利和自由，而是一个政治市场；其次，这个市场，就像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市场一样，只有自由竞争的出现才能区分这个市场。实际上，它们是由生产“政治物品”的公司操纵的。因此，同样的机制在现代政治市场以及商品、服务市场中运作，政治行为并非以公民的利益和政治偏好为指导，公民被强加符合政治参与者利益的价值观和指导方针。形成了社会经济与垄断资本政治意识形态霸权的整体系统。在古典资产阶级民主时代，年轻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需要政治自由和权利为资本的自由竞争提供政治保证，又要保护它免受传统精英（君主国家、贵族）的特权地位。对于现代性而言，晚期（僵化）资本主义不再需要古典资产阶级民主，它更像是一种标志，创造了它所代表的外观形式，退化为拟仿的民主，在政治操纵机制有效的情况下（包括政治技术，确保选民按照给定结果投票），积极的公民意志表达机制并不发挥作用，人民的力量没有实现，民主的深层含义受到破坏。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特点是民

主发展与大规模政治生产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大众政治生产关系体系产生了大众政治消费关系体系，政治意识形态市场拟仿的大众消费者成为商品和服务市场消费者的补充，为垄断资本的全面霸权形成了大规模和稳定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意识形态基础。

这些民主拟仿的产生，再生和保护 21 世纪的政治自由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即使从形式上来说，对于劳动人民民主也非常有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在于产生了需要操纵民主形式的市场和资本，其核心内容是垄断资本的总霸权，而这是对“一般民主价值”的拟仿。对于操纵民主的有效运作而言，需要在政治市场上保护民主形式、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游戏规则）和程序。因此，目前执政的自由民主党派和社会民主党派继续以“一般民主价值观”和“人权”的标签来影响民众，在社会民主停滞（如果没有瓦解）情况下运用保守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是非常有效的。

保守主义浪潮的反应强度与多数人社会地位恶化以及社会抗议的程度成正比。保守主义具体的政治形式体现为：从温和的、“文明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国家化）到半法西斯主义，其不过是垄断资本依附于国家操纵政治过程的管理工具之一。不幸的是政治实践并不总是与基本原则相一致，垄断资本不得不在损失财产和权力威胁之间进行选择，后者需要与威权主义者分享政治权力甚至直接进入法西斯主义状态。新世纪初的垄断资本克服资本过度累积内部和外部资源耗尽的瓶颈，开始倾向于寻求社会经济问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解决方案，操纵拟仿民主，向右保守主义转变，导致或多或少的温和或僵化。主要原因是全球资本的扩张与跨国资本的极限相冲突。2007—2009 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表明以创建虚拟金融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并非是无限的，但是回到社会民主主义先前形式的局部改革是不可能的。俄罗斯与自由民主模式相去甚远，民主化尝试演变成了 1990 年之后的社会经济危机，在这样的国家试图引入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模式是愚蠢的行为。由于 20 世纪初俄罗斯帝国所形成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社会经济关系被用以解决工业现代化问题，当前在无力发展民主政治的前提之下，右翼保守势力甚至有可能将俄罗斯再次引入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反动僵局。

因此，俄罗斯无法向民主回溯，而必须转向公众权力的真正实现，公民有组织的创造其社会生活形式，并拒绝回到后期资本主义半自由形式的僵局中。在这一形式框架下，公民协会代替异化的正式机构（法律、程序、官员、

警察）体系。100 年前，由于二月革命胜利而开始建立苏维埃体系，通过十月革命承担了建设新国家的责任，没有转向专政复辟而是转向了新的国家类型，以社会创造性力量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但是由于苏联的政治意识形态系统并未提供真正的自由思想，而以不适当的方法解决了大多数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难题，所以就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及其社会创造力、文化包容性而言，苏联的“解冻”时期相较于后期资本主义更加积极地实现出来。该政治体系的重要方面还在于，它解决了全国动员的任务，劳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资产阶级操纵的形式民主无法如此迅速地解决这些任务。抽象民主价值观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捍卫者在根本上回避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矛盾。社会主义与社会解放的支持者则需要积极面对社会主义的所有矛盾，向前推进，争取更多的人的真正自由。

布兹加林进一步在政治领域中提出探索人类社会解放道路的改革（革命）步骤：第一，充分肯定资产阶级民主以及早期政治自由的成就，其保证了消极自由，即免于政治意识形态强制以及非经济要素的胁迫；第二，资产阶级国家宪法（言论自由、集会等人权）的固定程序保证同样重要，并依赖于使这些抽象原则得以实现的社会经济内容。保证社会最低限度（最低工资、养老金、津贴）水平不低于该国最富裕公民平均收入的 10%—15%；对社会最富有成员的个人收入税率至少提高 50%；保证公共部门的就业而不是失业福利、免费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保健、文化产品，为实施社会政治和文化创造性活动提供空间；第三，限制私有财产权以及资本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在生态社会—人文主义框架下建立市场综合体系，其实施由民间社会控制，建立一套关系系统以保证雇员参与各种所有制企业管理，强制所有者承担使用其资源的社会责任，公共领域保障各种公有制形式的优先发展；政治过程中限制使用金融手段及其资源，保障政治组织活动的最大透明度，对公共和私人媒体的活动进行公共控制；第四，根据从议会制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建立政府机构，特别是真正将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代表纳入国家管理实际活动中，并以真正有效的群众组织和运动代表组建立法机构。这些步骤不再是（但不能低于）发展后期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民主要素的重大改革，只有在革命形势形成时，这些改革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才是可行的。

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没有本质区别，当这些自由民主的“外衣”最

终无力控制旧体制，解决现实危机的出路便从晚期资本主义这一经济—政治模式中产生，走向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改革，而不是在落后保守反动方向上的倒退。 对于未来人类社会的秩序而言，要么破坏形式民主和社会保护的最后要素，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半法西斯主义）口号之下形成保守主义，即比先前更加僵化的政治威权主义或垄断资本的经济—政治权力结构，要么社会主义力量真正崛起。

在“中心”国家最有可能将改革付诸实践的并非社会民主党，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组织、生态人道主义联盟以及左翼运动组织和部分工业无产阶级。俄罗斯的情况比“中心”国家更具争议性。首先，目前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右派自由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生活的右倾保守主义相结合；其次，五十年前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反对派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大多数成为保守派的支持者；最后，现实问题越来越挑战“白色”和“红色”之间的对立，一方面，多年来经济停滞和社会不平等加剧，加剧了底层阶级生活的危机；另一方面，官僚精英缺乏解决目前国家管理困境的能力。在俄罗斯缺乏强大的左翼民主主义运动并非偶然。俄罗斯必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朝向封建化方向逆转，同时在经济领域增加隐藏在寡头政权背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力量。在当前左派民主政治运动中的青年团体和创意阶层代表协会已开展出新左派倡议，有可能形成建设性抗议的基础，左翼社会民主运动的组织化将转变为建设性的反对派，如果上述趋势没有积极地开展出来，那么俄罗斯将面临右倾保守专政的威胁。

六、当代俄罗斯问题研究

斯巴列夫主要探讨了俄罗斯现代政治经济结构中工人阶级的分化、劳动阶级的团结危机及其产生根源问题，进一步指出虽然有学者将工资差异化作为决定性要素，但缺乏社会多元要素分析的视角。① 现代工人在劳动的功能和内容上是非常不同的，与福特制工厂体系中工人的同质化劳动相反，越来越区分为依靠较高智力和教育水平的“先进”工人与从事原始体力劳动的低技能工人，

① Э. Соболев Полит э кономия труда: кризис солидарности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2017. № 2.

即边缘化劳动群体。核心与边缘之间差异的扩大远远超过工人精英与中间阶层之间的差异，意味着跨专业差异将阶级差异推向极致。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中工人阶级也出现分裂，工人贵族的“资产阶级化”以及具有较低就业标准的“灵活”工人削弱了工作团结，因此难以集体保护劳工权利。中产阶级概念在统计学上是合适的，可以根据收入标准进行区分。然而要评估阶级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状态、发展趋势和性质，仅仅依靠收入标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要素在于人们的自我认同，以及他们对自己是谁的看法。将自己归类为中产阶级通常会形成某些特定观念，如消费、教育、休闲以及交往方式，因此以生活方式为标准，工人阶级中的中产阶层又会形成层次区分。因此，整个工人阶级正处于分裂、失去主体性的过程中。这个过程的趋势正在增强，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俄罗斯的主流趋势。

西方和俄罗斯的现代工会正处于严重危机之中：首先，工会数量相对减少。罢工作为劳工运动力量和团结的一个指标，随着经济增长的开始，几乎从社会实践中消失。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经济危机的爆发，罢工运动出现了一些复兴。但是没有达到新的定性阶段，2012 年发生的莫斯科抗议活动并非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冲突，因为活动在企业之外，而团结的基础不仅建立在经济利益的统一性中，政治偏好和态度的共识性也越来越重要，这种抗议活动有时会受到异质社会力量和运动的影响。

社会学调查表明，工人对现有社会经济状况基本不满意，但尚未准备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和经济利益。在俄罗斯，对劳动力领域社会经济地位恶化的容忍度非常高。如果没有遭遇罢工或威胁的风险，收益可能会大幅下降。即使薪水拖延也并不总是会导致罢工。罢工或威胁只有在不支付工资达到半年以上才会产生。很难想象西方的工人会继续工作而没有得到任何工资。许多学者认为，被动是长久以来俄罗斯民族心理的内在特征，但这不完全正确。在 20 世纪初。俄罗斯是一个强大的罢工运动国家，而在今天不利于劳工和工会运动的劳工形式占据俄罗斯劳动力的主流地位，罢工没有变成对雇主的压力。

这场危机的一个重要症状是工会运动的分裂，只剩下很少或仅仅是形式上的相互链接。从世界趋势来看，西方工会化的主要原因在于，适应刚性阶级对抗和工业组织体系的工会不再符合新的条件。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正在发生变化：第一，在技术变革的影响下，传统工业和群众劳工运动的基础被

削弱，工会数量的减少实际上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平行。工业工人阶级规模与工会数量之间有着直接和密切的相关性。受社会压迫的“低等阶层”主要由少数民族和外籍工人组成，落后以及分散状态剥夺了其独立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第二，传统的就业模式模糊不清，生产工人数量的减少，同时发展起来的是灵活的、非标准的就业形式，劳动个体化需要的是发达而灵活的个人合同体系；第三，现代经济中，专门从事劳动外包的机构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有较低就业标准的“灵活”工人削弱了工作团结，难以保护集体劳工权利；第四，由于洲际壁垒的减弱和移民流量的增加，民族和宗教原因冲突增强，而阶级冲突被削弱；第五，从社会对抗向商谈和伙伴关系转变，原则上解决了劳动群众的贫困问题。工会在生产中的存在不再是必要的，法律与各种国家和公共机构取代了工会。

在现代条件下无产阶级解体过程以及工人阶级数量的减少，导致了工人运动被边缘化，成为次要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所谓历史使命问题早已不再作为学术研究领域。无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的核心）是20世纪初的意识形态。从劳资对抗政策转向建设性合作这一普遍倾向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抵触，即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矛盾只会激化，西方国家的社会状况并非马克思、考茨基或托洛茨基所论证的，而是越来越倾向于伯恩斯坦。西方体系通过各种形式和机制，包括社会伙伴关系灵活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况，统一的社会结构日益分裂为众多日益自主和封闭的阶层和群体。这一分裂的过程体现为西方学者所谓社会的个体化以及现代经济体系运作的客观模式。

俄罗斯工会活动更多地转向官僚精英利益，而不是保护普通工人的利益。工会运动的削弱产生了许多问题：劳动在国民财富的再分配中总处于劣势；劳动生产领域的社会紧张局势加剧；在全国范围内劳动群体收入的整体水平下降。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分裂为不同层次和专业群体。团结危机最明显地体现在工人的抗议活动中。目前没有客观依据来重新评估劳动阶级的力量，因此，将俄罗斯劳工运动转变为自治社会力量的可能性是不具备现实基础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阶级斗争形式仍将十分薄弱。不能将2012年莫斯科街头集会和示威视为群众觉醒的性质：这一运动是发生在企业之外的狂欢和游行；莫斯科的抗议活动伴随着政府的沉默；抗议活动的主导力量是自由党和所谓的创造性阶级；这些抗议活动的诉求并不是经济性的，而是

政治性的，主要针对既定的权力制度。然而，这些集会强调了恢复工人阶级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关系，以及更为普遍地提出了社会中下阶层之间的团结问题。社会进步与群众分化为“强”和“弱”是分不开的。现代西方社会的社会基础是大资本和中产阶级的联合，底层劳动者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然而上述情况非常危险，充满了政治和社会经济的不稳定。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